战争与和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走向分析

周友刚

中国人民大学

摘要 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走向牵动世界格局，但美日两国正在将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抓手。本文从三国的国家性质出发，通过分析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现状，研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以全力避免战争，同时尽力争取和平友好的光明前景。美国无力再维系全球霸权，虽然人民爱好和平，利益集团却好战求战，并且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必须向外部攫取资源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却连年逆差、走投无路，试图再次用战争换取生存空间。因此，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综合实力在快速增长，始终缺乏战争动机，却只能被迫应对战争。

关键词 国家性质；三角关系；战争风险；和平友好

DOI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6 **文章编号** 2664–1127.2026.0801.61–74

引言

国家性质是决定中、美、日三角关系历史走向的核心变量。中国彰显和平内敛的一面性：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具备构建自给自足经济体系的自然条件，全无通过对外扩张获取资源的内在动力，这成为坚持永不称霸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大底气。美国东西临大洋、南北无强敌，人民缺乏领土扩张的诉求，少数利益集团却极力通过战争建立霸权、攫取利益，但遭到人民强烈反对时，又必然千方百计寻求和平，导致国家的两面性异常鲜明。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粮食自给率不足 40%，煤炭、石油等战略资源完全依赖进口，铤而走险或可逆天改命，以至于国民形成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所以呈现必须对外掠夺的一面性。

美国利益集团正在默许日本复活军国主义路线。美国军工、金融等少数利益集团，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亚太霸权，正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1 年）为基础，助推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路线，而且双方将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抓手。一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高调宣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还暗示放弃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并在政治、法律等层面加速复活军国主义，为扩军备战争取民意支持。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

作者简介：周友刚，男，满族，1983 年出生，河北秦皇岛人，中国人民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创新经济学、企业经济学。电子信箱 zyg031@163.com，https://orcid.org/0009-0007-4436-4278。

© **The Author(s) 2026.** CC BY-NC-ND 4.0.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3 November 2025; Accepted: 1 December 2025; Published: 15 January 2026.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 ISSN 2664–1127 (Print), ISSN 2664–1720 (Online), ISSN 2664–1747 (CD-ROM). Published by Creative Publishing Co., Limited 开元出版有限公司 (CPCL®). 国家新闻出版署备案, 中国图书进出口上海有限公司进口. Email: cpcl@cpcl.hk, https://ssci.cc, https://cpcl.hk.

案》，全面放宽美台双方高层交往的限制，要求台湾将防务预算提升至 GDP 的 5%，同时允许军工企业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装备。

中、美、日三国会发生战争吗？当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传统制造业、高端制造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大幅侵蚀了美日两国各项产业的利润，尤其是抗战胜利 80 周年阅兵展示了多款震惊世界的武器装备，足以动摇美日两国联合起来的军事优势 [1]。美国利益集团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必将勾结日本右翼势力，利用战争等一切手段迟滞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为此不惜牺牲中、美、日三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本文分析中、美、日三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为了鼓吹战争，而是为了全力避免战争，让世界各国人民永远享受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

一、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渊源分析

（一）中美关系历史

中美两国友好合作是主流。1784 年，美国在独立战争刚刚结束（1783 年）之后，立即派遣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驶往广州，开启了双方经贸、文化与外交往来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中美关系曾因美国的殖民扩张诉求出现波折，但美国友好人士协助中国创立了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等著名机构，更是在二战中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新中国成立之后，中美关系虽经历过朝鲜战争的剧烈冲击，然而 1972 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 年中美正式建交，又揭开了友好合作的新篇章，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融合格局 [2]。

中美两国文化内核高度相似。美国文化以基督教为重要源泉，中国文化以儒家、道家、佛家为主要支柱，两者表现形式迥异，但都蕴含着天下一家、人人平等的价值内核。基督教认为，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无论种族、阶层、贫富，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拥有同等的尊严与价值，并教导人们“爱人如己”，《加拉太书》更明确提出“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儒家倡导四海之内皆兄弟，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道家提出万物皆由道化生，在本源上并无高低贵贱之分，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佛家相信众生平等且人人皆可成佛，同时宣扬“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三家共同指向超越隔阂、平等相待的精神境界。

中美两国人民能够心意相通。心意相通本质上是相互理解、彼此欣赏，这并非抽象的情感表述，而是由具体人物、事件层层累积的历史经验。近代以来，詹天佑、竺可桢等大批留学生赴美求学，带回了西方先进技术与思想，美国友人也来华投身教育、医疗等公益事业，如洛克菲勒基金会援建北京协和医院。二战期间，中美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并肩作战，陈纳德将军率领飞虎队支援中国抗战，无数美国志愿军与中国军民携手抵御侵略，让两国人民结下了超越国界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两国民间交往从未中断，1971 年的“乒乓外交”以小球推动大球，打破了两国关系的坚冰，此后两国经贸、文化、科技等领域的民间交流日益频繁。

中美两国很难成为真正敌人。中美两国几乎不可能成为地缘政治的真正敌人：一是国土远隔太平洋，地缘敌对关系通常与领土接壤、势力范围重叠密切联系，而中美被广阔的太平洋隔开，缺乏直接的陆地、海洋领土争端，跨海作战需要承担天文数字的兵力投送、后勤补给等成本，且极易被对方军事力量打击，这使得主动进攻对方本土不具备可行性。二是两国均地大物博，掠夺稀缺资源、占领战略要地是引发地缘冲突的重要原因，但中美都拥有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基本可以支撑自身的民生保障、经济发展等核心需求，既没有必要占领对方领土来掠夺资源，也没有动力控制对方战略要地来获取经济红利。

中美两国产业结构高度互补。当今世界，国家关系主要由国际产业分工决定，而中美两国产业结构如下：美国擅长颠覆性创新（0-1），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一枝独秀，传统产业却已经彻底丧失竞争力，几乎完全失去市场生存空间；中国擅长模仿性创新（1-2），传统制造业的竞争力碾压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却长

期面临被卡脖子的风险，只能通过国家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术。这决定中美两国存在强烈的合作需求：美国政府为解决 3 亿人的民生问题，既需要保证日用商品具有物美价廉的供应渠道，又需要防止物价上涨降低人民生活水平；中国为降低模仿性创新的成本，必须紧紧追随美国颠覆性创新的脚步，引进先进设备、购买最新产品。

中美友好合作符合双方利益。这已经成为务必遵循的历史规律，美国政府越妄图与中国脱钩，越会发现与中国合作符合自己利益，反而越想搞好中美关系；美国内部越反对与中国合作的人们，越能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反而越会支持与中国合作。我们分别以尼克松和特朗普为例：尼克松是著名的反共斗士，1969 年初次就任总统时，态度依旧强硬，但深陷越战泥潭，在与苏联博弈中逐渐处于下风，只能重新审视中美关系，最终于 1972 年实现历史性访华；特朗普初次执政时期，推行激进的对华脱钩政策，2025 年重返白宫后，迅速将对华贸易战升级到全新高度，却导致美国物价飞涨、农产品积压，不得不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

由此可见，中美关系仍将以友好为主。自 1784 年中美正式接触以来，友好合作始终是主流，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内核高度相似、人民能够心意相通，而且两国远隔太平洋，都拥有辽阔的疆域、丰富的资源，很难成为地缘政治的真正敌人。另外，中美产业结构高度互补，友好合作符合双方利益成为不得不遵循的历史规律，尼克松是著名的反共斗士，却最终迫于现实利益的考量，于 1972 年实现历史性访华，而特朗普两次入主白宫之后，都推行激进的对华脱钩政策，却被迫改弦易辙，所以两国必将建立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二）中日关系历史

中日两国历史恩怨深似海。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既催生了悠久绵长的文化交融，也因地缘政治冲突积淀了超过千年的历史恩怨：近代之前，663 年，唐军在朝鲜白江口大败数倍于己的日军，日本转而潜心学习唐朝文化，然后于明朝洪武、嘉靖年间，日本倭寇频繁侵扰中国沿海，到万历年间，双方又在朝鲜大打出手，中日敌对情绪全面升级；近代以来，1894 年至 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并割地赔款，1919 年日本在一战后企图强占青岛，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1937 年日本开启全面侵华战争，1972 年中日邦交开始正常化，但日本右翼势力始终妄图复活军国主义路线。

日本国民形成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中国民众对日本国民性的概括一针见血：“倭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这精准道破了其赌徒式的生存逻辑：日本是资源匮乏的岛国，耕地面积不足国土 12%，石油等战略资源完全依赖进口，且常年受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威胁，安常守故必致江河日下，铤而走险或可逆天改命，导致赌徒性格深深地刻入民族基因。日本多次通过成功冒险而获利，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中国，获得巨额赔款，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跻身世界列强，偷袭美国珍珠港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占据绝对上风，使其形成冒险 = 突破 = 崛起的历史认知。

中国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1927 年，首相田中义一呈给昭和天皇秘密奏章《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将日本千余年的扩张逻辑白纸黑字地确定为国家战略，其核心表述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它充分阐明了将中国锁定为首选目标的底层逻辑：一是地理位置临近，满蒙（中国东北）与日本本土仅隔朝鲜半岛，是距离最近的大陆板块，所以日本侵华具备最低的军事与后勤成本；二是中国地大物博，奏折明确指出满蒙“资源丰富”，中国更是“物产丰饶之宝库”，控制中国成为日本突破岛国发展瓶颈的唯一选择。

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可谓是罄竹难书。自明朝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伤害贯穿数百年，从民间层面的劫掠滋扰，逐步升级为国家层面的侵略战争，其危害程度层层递进、罄竹难书。本文仅仅举出如下例子：明朝中后期，日本倭寇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导致原本富庶的东南沿海“村落萧条、生民涂炭”；近代以来，从甲午战争割占台湾、勒索巨额赔款，到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再到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中国的伤害从局部蔓延至全国。但是，二战之后，日本官方从未发布过针对侵华战争的书

面道歉文件，1995 年前首相村山富市向中国表达歉意的“村山谈话”，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且不断被后续继任者否定。

中国并未对日本造成过实质性伤害。纵观中日两国交往史，中国的立场始终是和平友好、自卫防御，从未主动对日本发起过侵略性、掠夺性的行动。白江口海战后，唐朝并未借机渡海攻日，反而继续接纳日本遣唐使，维系和平交往。明朝在倭寇最猖獗的时期，也没有放弃与日本进行外交沟通，万历年间出兵援朝，战场始终在朝鲜，没有延伸至它本土。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军事上的抵抗仅是保家卫国的自卫行为，未能对日本造成系统性的生命与财产伤害。二战结束后，作为主要受害国，中国并未像其他国家那样向日本索要巨额战争赔款，体现了以和平发展为导向的大国胸怀。

中国处理对日关系要借鉴美国经验。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换来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荒谬言论，但美国对日本以牙还牙，反倒建立友好同盟关系。本文充分总结了美国经验：先进行武力征服，美国对日本的武力征服不是普通军事打击，而是毁灭性军事打击—东京大轰炸与两颗原子弹彻底摧毁了日本的抵抗意志，让日本深刻认识到实力差距，并丧失了挑衅的底气；再确立主从关系，美国通过《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等一系列协议，确立了美主日从的政治格局—日本的安保、外交等政策必须服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这种不平等的依附关系让其最终俯首帖耳。

由此可见，中日关系友好是有条件的。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但日本对中国的伤害却贯穿数百年，从民间层面逐步升级到国家层面，其危害程度层层递进、罄竹难书，深层原因在于日本国民形成了孤注一掷的赌徒性格，并将中国作为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然而，纵观中日两国的交往史，中国并未对日本造成过任何实质性伤害，尤其是二战之后，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换来日本多任政府的持续挑衅，美国对日本以牙还牙，却建立友好同盟关系，两者对比鲜明，所以我们要充分借鉴美国处理对日关系的成功经验。

（三）美日关系历史

美日两国信任赤字难化解。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闯入江户湾，要求日本开放港口通商，从此开始了两国复杂的历史纠葛：二战之前，1858 年两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两国逐渐出现利益冲突，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两国爆发直接战争，1945 年美军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促使日本宣布投降；二战之后，麦克阿瑟通过推行土地改革、削弱天皇权威等方式将日本改造成民主国家，1951 年两国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获得日本驻军权，日本处于附庸地位，1985 年美国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日本进入失去的三十年。

美日两国分别位于太平洋东西两岸。美日两国在地理与自然资源等方面，几乎构成了国家形态的两个极端，这从根本上塑造了两国截然不同的生存基础与发展逻辑。美国本土面积超过 900 万平方公里，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仅有加拿大、墨西哥两个陆地邻国，为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战略安全感，同时拥有约 160 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可耕地，矿产资源种类齐全，这赋予了其巨大的战略自主性。日本国土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仅为美国的 4%，四面环海、绝对孤立，缺乏战略纵深，耕地面积约 5 万平方公里，粮食自给率长期低于 40%，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极度贫乏，生存只能依赖海外资源，发展只能依靠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日本国民性导致两国很难真正友好。一是地理双重性，美日两国的国家主体相隔约 8000 至 10000 公里，但若论主权领土的延伸，两国又几乎毗邻而居，美国的阿拉斯加、关岛与夏威夷，距离日本约 1000 至 2500 公里，正好在现代军事力量的打击范围之内，美国军队很容易就到日本家门口，所以这种毗邻带给日本一种被巨人笼罩的等级感和压迫感。二是日本国民性，作为被海洋包围的岛国，资源贫乏是日本国民潜意识中最深层的恐惧，而这种恐惧会转化为近乎疯狂的军事掠夺或经济掠夺，面对资源丰富的美国，日本垂涎三尺是本能，或者通过捆绑式的战略依附，换得稳定的资源供应，或者通过武力击溃美国，确保资源通道的绝对安全。

美日两国很容易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日本基于岛国生存逻辑的扩张诉求，与作为太平洋支配性强权的

美国，很容易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本文举以下两个例子：一是佩里叩关，1853 年，日本正以封闭隔绝外部威胁，同期美国正推进太平洋航线的开拓与贸易霸权的构建，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闯入江户湾，以武力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个港口，锁国体制被强行打破；二是太平洋战争，1941 年，日本为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构想，与美国在太平洋剧烈冲撞，美国为维护在菲律宾等殖民地的贸易特权，对日本进行战略物资禁运，直接掐断了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全面引爆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若控制中国将会严重威胁美国。日本的贪婪和欲望永无止境，明治维新时期就将国策定为“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致使日本成为美国永远的潜在威胁。然而，美国的最大噩梦却是日本控制中国，即日本的狼子野心与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美日两国将很快进入战争状态。本文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的事态发展为例：日本依靠中国东北丰富的粮食、煤炭、石油等自然资源，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战争经济体系，军事野心随之膨胀，从蚕食中国到进军东南亚，目标直指美国的菲律宾、关岛等殖民地，两国核心利益猛烈碰撞，最终导致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被迫卷入战争，并付出了巨大物质代价和人员伤亡。

美国面临如何管控日本的历史难题。二战之后，日本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综合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而如今美国对日本的管控，早已不是战后初期的绝对主宰。美国需要思考如何管理日益强大的日本：一是高昂的军事控制成本，驻日美军的基地建设、人员安置等开支长期居高不下，并且还要持续投入先进武器装备，来维持自身的军事优势；二是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其本质都是挣脱美国的军事枷锁；三是日本国内民众的抗议，日本民众不断抗议美军基地的扰民问题，如噪音污染、士兵犯罪等，形成强大舆论压力，直接冲击美日同盟的社会基础。

由此可见，美日关系本质上不会友好。美日两国几乎毗邻而居，却拥有截然不同的生存基础与发展逻辑，日本贪得无厌的国民性导致两国难以建立真正友好关系，并且很容易发生地缘政治冲突，如佩里叩关、太平洋战争，所以两国存在难以化解的信任赤字。但是，美国的最大噩梦将是日本控制中国，即日本的狼子野心与中国的丰富资源相结合，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的事态发展就是典型例证。日本如今的综合实力已位居世界前列，正在千方百计挣脱美国的军事枷锁，这使得美国面临如何管控日本的历史难题。

二、中、美、日三国发生战争的风险分析

（一）中美发生战争

美国利益集团致力于追求利益最大化。一是利益集团掌握决策权，西方发展模式导致财富与权力高度集中，军工复合体、金融资本集团与政府重要部门之间人员双向流动，同时通过资助媒体、智库影响公共话语，这使得少数掌握大量财富的利益集团，完全可以主导战争决策。二是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利益集团构建了一套极其扭曲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核心是“收益私人化、成本社会化”，军火销售、战后重建以及对资源产地和贸易通道的控制都会产生巨额利益，士兵生命、国防开支等成本却由国家和社会来承担[3]。

军工复合体攫取了美国战争决策权。军工复合体是由军队、军工企业和部分国会议员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早在 1961 年 1 月，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海陆空三军需要先进武器，必须先经国防部备案，然后再向国会军事拨款机构进行申请，最终交由军工企业生产、科研机构研发。军工企业、科研机构需要国防拨款，而同国防部关系特别密切的卸任要员可为其谋取更多利益，以此成为上述企业与机构的争夺对象。国会议员需要获得选民支持，必须让自己选区的军工企业、科研机构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所以这些议员费尽心机向国会争取预算拨款。

军队、军工企业与国防部门之间存在制度性旋转门。军队退役将领可以进入军工企业领导层，军工企

业领导层通常能够转任国防部要职，国防部卸任人员又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国会议员还会持有军工企业股份，各方利益深度绑定。由此，军工复合体全面渗透进美国军界、政界，以阿富汗战争为例，掌握主要决策权的前副总统切尼、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都曾经在军工企业任职，其中前副总统切尼，在老布什政府任期结束后，卸任国防部长职位，不久就担任了著名国防承包商——哈利伯顿公司的高层领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不仅愈加强大，而且打着“民主自由”、“国家安全”的旗号，挟持了美国政府。

军工企业是军工复合体的核心组成，却被贪婪和欲望永无止境的金融资本所控制。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洛普·格鲁门、通用动力是美国最主要的军工企业，而它们的主要股东全是金融资本性质的著名投资机构，比如洛克希德·马丁，前三大股本股东是道富集团、领航集团以及贝莱德。挑起战争、扩大战争是金融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2021 年 9 月，布朗大学发布的《战争的利润：“9·11”事件后美国五角大楼开支激增的企业受益者》研究报告显示，自 2001 年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以来，国防开支总计超过 14 万亿美元，其中将近一半流向了军工企业，而这些军工企业依靠战争带来的利润赚得盆满钵满。

表 1: 美国主要军工企业和国防承包商的股权结构（截至日期：2025 年 12 月 5 日）

股本股东	洛克希德·马丁	波音	诺斯洛普·格鲁门	通用动力	哈里伯顿
第一大股东	道富	贝莱德	道富	Longview Asset	领航集团
占总股本	15.80%	7.10%	9.60%	10.20%	12.21%
第二大股东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领航集团	Capital World
占总股本	9.40%	6.50%	8.40%	7.90%	11.64%
第三大股东	贝莱德	Capital Research	贝莱德	Newport Trust	贝莱德
占总股本	7.80%	5.30%	7.40%	5.70%	9.52%

数据来源：各公司财务报告

中国全面动摇美国利益集团的生存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一是实体经济崛起：中国以完整工业体系为支撑，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全球第 2 名至第 10 名的总和，在光伏、高铁、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不仅打破了美国金融资本长期垄断高端产业利润的格局，还利用人民币跨境结算瓦解美元霸权。二是军事工业突破：中国军工以“装备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高效模式，在局部领域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六代机、055 型驱逐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装备的性能已碾压美国，致使美国军工复合体难以再通过军事威慑获取高额利润。

美国利益集团很可能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任何反动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美国利益集团与霸权体系密切联系，打压中国是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选择，也是其行为逻辑的必然表现。本文仅仅举出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第一，联合盟友构筑“小院高墙”，封锁华为、中兴等中国高科技企业，同时严控对华光刻机、高端芯片等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第二，推动盟友供应链与中国脱钩，胁迫欧洲国家限制中国投资或使用中国设备，试图打造绕开中国的产业链，以削弱中国产业的全球竞争力；第三，利用台湾问题挑起战争风险，美国密集向台湾出售敏感武器，并为台军提供秘密训练，通过强化军事合作提升台海紧张局势。

总体看来，美国利益集团有强烈动机挑起战争。美国的军工复合体、金融资本等利益集团攫取了战争决策权，却构建了“收益私人化、成本社会化”的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以至于挑起战争、扩大战争是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但是，中国实体经济崛起与军事工业突破全面动摇了美国利益集团的生存基础，而任何反动势力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打压中国、封锁中国，甚至挑起对中国的战争是军工复合体、金融资本等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所以中国人民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二）中日发生战争

日本充当美国利益集团的战争代理人。美国的盘算是：中国作为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足

以摧毁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即使美国在常规战争中打垮中国，也将付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重代价，完全违背了利益集团的逐利本性，这是其选择代理人战争的根本原因。日本的盘算是：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综合实力虽已位居世界前列，相比中国却差距悬殊，但日本与美国联合起来的综合实力，相比中国则依旧占据上风，而且中国与美日较量，即便胜利，也将受到极大削弱，所以日本乐于充当美国利益集团的代理人。

中国的国家性质彰显明确的一面性。中国和平内敛的国家性质，根植于地大物博的资源禀赋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在农耕时代，粮食、矿产、手工原料等核心生产生活资料均可内部供给，这从根源上消解了通过对外掠夺、殖民扩张获取资源的内在动力，致使和平发展成功刻入文明基因。步入现代社会，以广袤国土和丰富资源为支撑，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无需通过对外扩张保障发展需求，这是坚持永不称霸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最大底气。以中日关系为例，中国在抗日战争中军民伤亡超过 3500 万人，但战后没有选择复仇式对抗，而是积极推动邦交正常化，同时坚持对话协商解决钓鱼岛等主权争议问题，反对单方面激化矛盾。

日本却并未对中国的善意心怀感激。日本自身野心与美国亚太战略已经深度绑定，双方现在狼狈为奸、各取所需。第一，日本右翼一直谋求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实现正常国家化，乃至成为军事大国，充当代理人正是获得美国支持的关键筹码。第二，美国直接与中国对抗的代价过高，而日本是其亚太核心盟友，综合国力强劲，无菲律宾国力弱、韩国受朝鲜牵制等短板。第三，中日之间有复杂的历史恩怨，以及钓鱼岛、琉球群岛等现实主权争议，致使遏制中国成为美日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第四，日美军事合作已实现全方位深度融合，美国可以很便捷地调动日本的军事力量，也让日本有胆量在挑衅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持续逆差的困局。自 2020 年起，日本连年贸易逆差，其中 2022 年逆差峰值超过 1500 亿美元，以至于进入“买原料贵、卖产品难”的死循环：一方面，资源依赖度接近极限，石油 99%、铁矿石 100% 需要进口，粮食自给率不足 40%，近期日元贬值又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另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押注氢燃料错失主流赛道，传统汽车、半导体等优势产业又受中国崛起严重冲击，出口持续下滑。日本这种资源小国，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对冲贸易逆差，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下降，国内社会矛盾将逐渐加剧，未来只能依靠在国际市场上出卖劳动力维持基本运转，最终结局必定是“永世为奴”。但是，日本国民能接受这种残酷的命运吗？

美国能在中日战争中获取巨额利益。中日作为 2025 年全球第二、第四大经济体，其经济体量、产业层级显著领先俄乌，若爆发战争，美国的获利规模将远远超过俄乌战争。一是军工收益，日本对高端武器需求极强，美国军工企业可借机向其出售大量高价装备，同时股价也会大幅上涨。二是金融收益，中日战争必会引起全球动荡，这将推动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美国资本还能以低价抄底两国优质资产。三是产业红利，中日掌控着全球汽车、电子等高端制造业，美国可以趁机抢占两国的市场份额，助推国内再次振兴制造业。四是战略红利，既能直接消耗中国发展动力，又能继续扩大驻日军事存在，还能推迟亚洲世纪的到来，让美国实现一石数鸟的全球战略。

美国将竭力挑动中日两国发生战争。2025 年 12 月 4 日，美国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外交与安全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全球领导转向本土优先，报告明确宣告彻底抛弃冷战后长期奉行的全球干预模式，回归门罗主义理念，战略重心转向本土与西半球，同时大幅削减对欧洲、中东的战略投入与重视程度。二是从全球主义转向国家主义，报告摒弃了以往推崇的国际合作、自由贸易等全球主义理念，奉行强调美国核心利益的国家主义，将资源集中用于本土再工业化、关键供应链独立等经济事务。但是，报告将阻止台海冲突列为优先任务，同时要求日韩增加军费投入、强化集体防御，这充分反映了美国利益集团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心理。

总体看来，美国利益集团会极力促进战争发展。中国作为核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足以摧毁美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美国利益集团与中国发生直接战争，将付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惨重代价，

所以代理人战争符合其逐利本性。中国始终以善良包容的态度处理对日关系，但日本经济已经陷入持续逆差的困局，面临“永世为奴”的残酷命运，很可能充当美国的战争代理人，而且美国利益集团能在中日战争中获取远远超过俄乌战争的巨额利益，必将竭力挑动中日两国发生战争，中国人民绝不可心存幻想。

（三）美日发生战争

美日两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双方关系。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先天条件出发，一个国家在长期发展中会形成一种类似性格的稳定特质，表现为特定的行为倾向与战略偏好，这种由自然条件塑造的国家行为模式，可称之为“国家性质”。它的底层逻辑是自然条件决定生存方式，生存方式造就国家行为，虽然这并非一成不变的历史宿命，会随着技术进步、时代发展而不断调整，但始终是一国战略决策无法摆脱的刚性约束。

美国的国家性质凸显强烈的两面性。一是广大民众爱好和平，美国东西临大洋、南北无强敌的地缘格局，让其本土免于大规模战乱的直接冲击，民众对领土扩张的诉求远低于历史上的其他陆权国家。二是利益集团好战求战，战争能给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利益集团带来巨额订单，也能帮助美国巩固霸权地位，导致利益集团的诉求往往能够转化为国家政策。这两种倾向是对立统一关系：当利益集团主导的战争，综合成本远超社会可承受范围时，广大民众与利益集团形成尖锐对立，比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当民众能够享受战争带来的红利时，可以与利益集团达成共识，自然支持政府的战争决策，比如二战实现了经济腾飞与霸权崛起。

日本的国家性质呈现鲜明的一面性。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必须向外部攫取资源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二战之前，资源与市场被西方列强长期垄断，日本身为后发岛国，既无殖民地资源支撑，又缺乏平等贸易话语权，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掠夺资源、获得赔款，快速完成资本积累。二战之后，军事掠夺的路径被彻底堵死，日本依托技术优势，通过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换取资源、占领市场，同时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资源，维持自身产业优势。但是，随着中国崛起，日本家电、汽车以及电子等多个主导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出口能力持续下降，已经连续多年贸易逆差，国家即将陷入“永世为奴”的战略困境。

美日两国的潜在冲突要远大于中日。根据中、美、日三国的国家性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美国的两面性中，利益集团好战求战的本质是通过经济、军事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攫取经济利益，而日本向外获取资源的本质，同样是通过经济、军事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攫取经济利益，但全球资源总量和市场容量都是有限的，两国发生激烈争夺几乎是历史必然。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本质是自给自足，依托广袤国土、丰富资源与完整工业体系，无需通过攫取全球经济利益来维系自身发展，更无需与日本争夺全球经济资源，两国冲突仅源于日本因自身资源贫乏，掠夺中国经济资源的内在冲动，这与美日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根本区别。

美国对日策略必然是防备多于利用。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饶，但日本依靠对外掠夺谋求发展的底层逻辑从未改变，只是手段在发生切换。二战中偷袭珍珠港、巴丹死亡行军等暴行早已在美国民众心中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当下日本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动向，更会强化对其重走扩张老路的担忧。美国利益集团对日本是“利用为表、防备为里”，既将其当作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前沿打手，借助其地缘位置和军事力量分担霸权成本，也深知其扩张本性。一旦日本通过扩军、修宪获得足够的自主能力，美日就会变成对手，所以美国必须通过驻日美军、同盟条约等手段对其进行深度捆绑和压制，以防备其脱离掌控。

日本挣脱军事枷锁后可能对美开战。第一，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是日本民族记忆中最深的伤痕，很难随时间而消散，已经成为民间反美情绪的隐性导火索。第二，二战后日本处于美国的附庸地位，长期遭受经济盘剥，汽车、半导体等主导产业屡遭制裁或打压，《广场协议》更是直接导致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第三，日本近年防卫费用持续上升，军事力量快速增强，如装备射程超过 1000 公里的导弹等等，足以瘫痪驻日美军基地，甚至威胁美国在亚太的军事部署。第四，日本历史上素有“赌国运”的冒险传统，若美国因深陷地区冲突而实力削弱，很可能再次上演偷袭珍珠港那一幕，趁机对美军发动突袭。

总体看来，美日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异常脆弱。美国的国家性质凸显强烈的两面性，广大民众爱好和平与利益集团好战求战并存，而日本的国家性质呈现鲜明的一面性，即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必须向外部攫取资源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决定美日两国潜在冲突大于中日，同时美国对日本的防备多于利用。日本历史上素有“赌国运”的冒险传统，近年防卫费用持续上升，军事力量快速增强，若美国因深陷地区冲突而实力削弱，很可能再次上演偷袭珍珠港那一幕，趁机对美军发动突袭。

三、中、美、日三国和平友好的前景分析

（一）中美和平友好

中国务必辩证处理美国的两面性。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中国强大才是两国和平友好的坚实基础，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例：一条线，中国综合实力持续增强，1964 年原子弹试爆成功，1967 年氢弹试爆成功，1971 年重返联合国，1978 年改革开放，2010 年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2025 年六代机多次试飞、第一艘电磁弹射航母服役；另一条线，中美冲突程度逐渐下降，1950 年两国在朝鲜战争中直接交战，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18 年中美开展贸易战，2025 年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承认两国已经势均力敌 [4]。

中国的一面性与美国的两面性对比鲜明。中国和平内敛的一面性，决定了对外政策始终以互利共赢为底层逻辑，缺乏通过对外掠夺、建立霸权满足发展需求的内生动力。但是，美国具有两面性，对华政策在广大民众爱好和平与利益集团好战求战之间反复摇摆，而最终走向取决于美国通过战争或霸权施压中国的成本与收益对比。当中国弱小时，利益集团通过贸易制裁、军事威慑等手段打压中国，无需付出过高成本，就能获得超额利益，其霸权逻辑会占据上风，民众也将默许。当中国强大时，带来的合作机遇会让民众享受和平红利，利益集团再挑起战争却可能受到毁灭性打击，这将倒逼美国对华政策回归和平友好轨道。

中国强大可以给美国人民带来巨额利益。这会通过与很多关键阶层形成利益绑定，直接转化为选举中的选票压力。本文举例如下：一是农业州票仓，中国是美国大豆、玉米的主要订单来源，贸易战导致对华大豆出口份额腰斩，势必引发艾奥瓦、伊利诺伊等农业州的选票反噬；二是占比超 60% 的工薪与中产阶层，中国提供物美价廉的服饰、家电等消费品，直接降低家庭日常开支，这部分选民很可能用选票惩罚对华加征关税；三是高影响力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对高端芯片等高科技产品有强烈需求，但强制对华脱钩会导致英伟达等高科技企业损失大量订单，相关从业者与投资者会激烈抵制反华候选人。

中国强大才能让美国利益集团望而却步。美国持续在中国周边挑起事端，比如南海、台海等等，本质是军工复合体通过制造冲突售卖武器牟利，但中国的综合实力正在快速提高，足以对其进行致命打击。一是军事硬实力：中国部分武器装备的性能已经远超美国，比如东风 61、055 型驱逐舰等，美国兵棋推演多次显示与中国冲突将毫无胜算，航母极容易在南海或台海被击沉，同时损失上百架战斗机，伤亡数量更是惊人。二是供应链反制：中国工业产值世界第一，仅造船能力就是美国的 230 倍，并且控制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精炼，美国的导弹、战机等先进武器极端依赖这些材料，例如，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后，F-35 因稀土断供延迟交付。

美国利益集团最终必定选择与中国合作。美国利益集团的终极主宰是华尔街的金融资本，军工复合体只是其盈利工具，中国强大让其成本与收益对比愈发清晰，即“合作 = 高收益、低风险”“对抗 = 高成本、低回报”。第一，金融资本的核心诉求不是打赢战争，而是稳定回报，在华美企 2025 年营收总额超过 3000 亿美元，华尔街通过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获利丰厚。第二，中国拥有全产业链，可以让美国的技术优势迅速转化为超额利润，例如，特斯拉上海建厂，华尔街通过融资、持股深度参与，共享产业红利。第三，华尔街通过旋转门深度掌控国家政策制定，其逐利选择会直接影响政府决策，这必将推动美国逐渐转向与中国务实合作。

中国处理对美关系切忌采取一边倒政策。从国家性质差异出发，中国处理对美关系的理性选择，必然是摒弃一边倒，娴熟运用两手对两手的辩证策略：一方面，立足自身和平内敛的特质，坚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深化与美国农业州、工薪阶层以及高科技产业的利益绑定，放大美国内部和平友好诉求，对冲利益集团的霸权图谋；另一方面，针对利益集团的好战求战，要坚守核心利益底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最关键的是让美国民众充分认识到战争成本超出社会可承受范围。唯有如此，中国才能跳出“妥协必受损、对抗必双输”的陷阱，在中美博弈中掌握主动权，实现“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的战略目标。

综上所述，中美两国即将实现长期和平友好。中国的一面性与美国的两面性形成鲜明对比，致使中国强大才是两国和平友好的坚实基础，这既会通过与美国很多关键阶层形成利益绑定，直接转化为选举中的选票压力，也能给美国利益集团造成毁灭性打击，使其对挑衅中国望而却步。当前，中国工业产值世界第一，控制了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精炼，部分武器装备的性能已经远超美国，而美国利益集团的终极主宰是华尔街，同样能从与中国合作中获得巨额利益，所以美国的两面性将逐渐转向对华长期和平友好的一面性。

（二）中日和平友好

中国必须坚决打击日本的一面性。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日本从自身资源禀赋、国民性格出发，始终无法压制掠夺中国资源的内在冲动，只有在中国能够给予其致命打击之时，两国才能和平友好相处：在唐朝，中国文化鼎盛、万国来朝，白江口海战之后，日本积极派遣遣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正是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将其册封国名由倭国改为日本；在民国，中国军阀混战、积贫积弱，日本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先占领东北，再开启全面侵华战争，妄图彻底灭亡中国，同时永久占据中国的富饶资源。

中日两国的一面性反差强烈。中日是永远搬不走的邻居，这种与生俱来的地缘绑定，让国家性质反差，成为两国关系无法回避的底层矛盾。中国依托地大物博的资源禀赋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缺乏掠夺或控制日本的内在动力，即便背负抗日战争的血海深仇，仍主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并且处理对日关系始终以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为核心诉求。日本作为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岛国，生存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输入，而幅员辽阔、资源富饶的中国，是其长期觊觎的目标，地理邻近反倒成为发动侵略的便利条件，这本质上是其掠夺性在地缘政治下的充分展现。因此，当中国能够打垮日本时，地理邻近才会转化为促进和平友好的桥梁。

日本已发出清晰的战争信号。2025 年 11 月 10 日，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明确表示，无法保证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会继续写入“不持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2025 年 12 月 18 日，《朝日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首相官邸一名高级官员当天对记者声称，鉴于周边安全环境日益严峻，“日本应当拥有核武器”。本文分析其深刻的现实背景：2025 年，中国贸易顺差超过 1 万亿美元，各项产业横扫世界，致使日本走投无路，表现为产业节节败退、长期贸易逆差。本文回顾残酷的历史事实：1929 年，大萧条席卷世界，出口大国日本深受其害，当年就有超过 400 万人失业，80% 以上的民众支持对中国动武，于是在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切莫误判日本战略意图。中国习惯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善意对待他国，从而忽视日本国民“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性格特点，若对日本的核野心和军事冒险心存幻想，必给国家安全留下致命隐患。日本的国家战略从来不受实力对等束缚，而是信奉出奇制胜的赌徒逻辑：1904 年 2 月 8 日夜间，日本国力远逊于沙俄，却偷袭停泊在旅顺港的俄国太平洋舰队，使其遭受重创，两天后才正式宣战；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 GDP、工业产值分别约为美国的 1/6、1/10，却偷袭其太平洋舰队总部—珍珠港，第二天才正式宣战。因此，中国的善良包容与和平愿景，不可能被日本视为善意，反而会被视为软弱可欺。

中国只能全力准备对日战争。日本放弃无核三原则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早已具备即刻转化为实战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公开报告显示，截至 2025 年，日本已囤积超过 47 吨钚，其中 10 吨为武器级，按每枚原子弹需要 6-10 公斤钚计算，至少可以制造千余枚原子弹。与此同时，日本三菱重工已掌握核弹头组

装技术，HVGP 系列导弹可以直接转化为洲际导弹，超级计算机能完成核爆炸模拟，即日本离拥有核武器只差一道行政命令。以日本“以小搏大、出其不意”的国民性，一旦突破“不制造核武器”的心理与政策底线，就会复制偷袭传统，在关键时刻对中国发动核突袭，届时将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颠覆性冲击，所以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打垮日本才会和平友好。中国对日战争是正义的，也将必然取得胜利，其核心目的既是为了守护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也是为了避免日本人民再次沦为军国主义的牺牲品，还是为了防止日本颠覆亚太乃至全球的长期和平局面。中国打垮日本的标志主要是以下两点：一是彻底去军事化，特别是根除制造核武器能力，全面销毁日本囤积的武器级核材料，拆解其具备军工潜力的相关技术与产业，从物质层面封死其重走军国主义道路的可能性；二是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取缔美化侵略历史的右翼势力与相关机构，肃清教育、舆论领域的军国主义余毒，推动日本形成反思战争的社会共识，从思想根源上铲除军事冒险的土壤。

综上所述，中国成功制服日本才能和平友好。中日两国的一面性反差强烈，中国依托地大物博的资源禀赋与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处理对日关系始终以睦邻友好、和平共处为核心诉求，但日本从自身资源禀赋、国民性格出发，始终无法压制掠夺中国资源的内在冲动。目前，日本再次发出清晰的战争信号，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切莫误判日本战略意图，必须全力准备对日战争。只有在中国打垮日本，实现彻底去军事化和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两项战略目标之后，两国才能建立长期和平友好关系。

（三）美日和平友好

美国需要有效平衡日本的一面性。分析美日关系的历史，两国从未建立深层和平友好关系，以二战以来为例：一方面，美日关系处于最好时期，美国推动日本民主化改革、制定《和平宪法》，为其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而后美国向日本开放大量先进技术专利，日本通过引进、吸收，迅速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方面，日本内部反美声音从未停息，1989 年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与右翼政客石原慎太郎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最具代表性，书中批判美国傲慢短视，主张摆脱对美依附关系，让两国矛盾彻底公开 [5]。

美日两国都需要排他性扩张。全球资源总量和市场容量的有限性，是美日对外扩张具有排他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两国难以建立深层和平友好关系的重要原因。美国是霸权垄断：通过掌控全球资源分配权与市场规则制定权，确保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绝不允许日本触碰自身核心利益，如 1975-1991 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威胁其垄断地位，随即对其运用关税战、301 调查等手段，使日企受到严重打击。日本是生存独占：由于始终必须从外部攫取能源、矿产等经济资源，二战之前选择以军事掠夺完成资本积累，二战之后依靠优势产业赚取资源、占领市场，而两国在高端制造领域竞争激烈，如 2025 年 4 月，特朗普坚持对日本进口汽车加征 25% 关税。

美国已无力再维持全球霸权。美国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但已没有办法维持二战之后建立的全球霸权体系。一是国债规模失控：截至 2025 年 12 月底，国债总额突破 38 万亿美元，每年利息支出超过 1.2 万亿美元，占联邦财政收入的比重超过 20%，被迫借新还旧，霸权的经济基础严重削弱。二是军事战略收缩：2025 年 12 月，五角大楼推进大规模军事改革，合并中央/欧洲/非洲司令部为国际司令部，整合南方/北方司令部为美洲司令部，霸权的军事投射能力大幅下降。三是内部斗争激化：党派对抗、社会撕裂、阶层固化等问题愈演愈烈，致使美国无法再拿出冷战时期那种长期、统一的战略规划，霸权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彻底受损。

日本不可能甘心受美国管控。美国霸权衰落必然重塑美日同盟的内在逻辑，两国之间将从“主从关系”逐渐转向“准平等伙伴关系”，双方矛盾必定持续凸显。一是战略分歧：美日同盟充满了功利性，美国为了将日本打造成印太前沿支点，只能松绑其军事限制，默许其扩充军力，但这使得其军事自主性显著提升，不再完全依附美国，甚至利用美国的安全承诺，主动挑起地区争端。二是利益冲突：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利己主义，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产业回流等政策维护自身利益，而日本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与美国在汽车、

半导体等领域存在激烈竞争，双方关于产业政策、关税谈判等议题的矛盾会日益公开化。

日本必会采取措施反噬美国。以日本“隐忍蓄势 + 择机突袭”的民族特质，在美日实力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反噬美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问题。一是隐忍与复仇的双重性：日本国民“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性格特点，使其对美国的顺从只是权宜之计，而非真心臣服，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广场协议》的经济打压，都是被压抑的复仇火种，势必会清算历史旧账。二是正常国家化的执念：和平宪法、军事限制被日本右翼视为民族耻辱，借美国需要日本充当印太棋子的窗口期，加速修宪、扩军，本质是为“摆脱美国控制、实现战略自主”铺路，当美国陷入多重危机之时，很可能伺机进行战略反杀。

美国最终将选择与中国合作。美国的战略决策非常务实，始终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很可能在霸权衰退期选择抛弃日本，转向与中国合作。一是中国和平内敛 + 实力增长：由于一贯坚持和平发展，中国绝不会主动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寻求对等尊重、互利共赢，这对财政紧张、战略收缩的美国而言，是可预期的低风险、高收益选项，远好于与日本捆绑陷入高风险对抗。二是日本赌徒性格 + 信任赤字：美日两国信任赤字很难化解，日本借美国战略收缩之际，主动挑起台湾问题，将其拖入与中国的地区冲突之中，妄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但美国不可能为日本的赌徒行为买单，反而会通过抛弃它来切割风险。

综上所述，美国将会选择联合中国管控日本。美日两国都需要排他性扩张，美国是霸权垄断，日本是生存独占，但全球资源总量和市场容量是有限的，导致两国难以建立深层和平友好关系。当今，美国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却出现国债规模失控、军事战略收缩以及内部斗争激化等多种问题，已经无力再维持全球霸权，而日本国民“强必盗寇，弱必卑伏”的性格特点，使其必定采取措施伺机对美国进行战略反杀。因此，美国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很可能在霸权衰退期选择抛弃日本，转向与中国合作。

四、政策建议

为什么要研究战争？是为了世界和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走向牵动世界格局，但美日两国正在将台湾问题作为遏制中国的核心抓手。本文从三国的国家性质出发，通过分析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现状，研判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以全力避免战争，同时尽力争取和平友好的光明前景。美国无力再维系全球霸权，虽然人民爱好和平，利益集团却好战求战，并且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必须向外部攫取资源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却连年逆差、走投无路，试图再次用战争换取生存空间。因此，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综合实力在快速增长，始终缺乏战争动机，却只能被迫应对战争。

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但要冷静、克制，尽一切努力把和平希望提到最高，将战争风险降到最低。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筑牢胜利之本，全心全意服务人民。“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论持久战》），即人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力量，所以党和政府必须全心全意服务人民。一是改善民生，积极解决就业、教育、医疗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通过缩小贫富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政治局面，让任何遏制中国的图谋，都遭到全体人民的坚决反对。二是倾听民意，“兵民是胜利之本”，必须依靠人民、信任人民、服务人民，向人民说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坚定立场，以及被迫应对战争风险的客观事实，号召全体人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坚决反击一切侵略势力。

（二）分化美日联盟，促使美国看清真相。美日联盟并非铁板一块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务必戳破美日双方各怀鬼胎的内在逻辑，推动美国社会各界看清纵容日本的真实代价：其一，客观分析美日之间的战略冲突，日本试图借助美国的安全承诺突破战后和平体制，谋求军事大国地位，甚至核武器，本质是将其视为实现正常国家化的跳板，若美国怂恿日本军事冒险，最终会遭到战略反杀；其二，透彻分析中美合作的长远价值，美国内部的经济困境、社会撕裂等问题，远非遏制中国所能解决，与中国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

域开展合作，反而有助于解决国内问题，但联合日本遏制中国，只会引发深层战略反噬。

（三）分化美国内部，孤立美国利益集团。以军工复合体为代表的少数利益集团为攫取战争红利，不惜将国家拖入大规模地区冲突，其好战行径严重背离美国社会爱好和平的主流民意，所以分化美国内部是降低战争风险的关键抓手。一边，扩大中美在农业、高科技等领域的双边合作，让美国社会享受到与中国合作的红利，同时借助民间交流、智库对话等渠道，传递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立场，唤起美国内部的反战力量。一边，摆事实、讲道理，向美国人民与国际社会揭露利益集团通过战争谋取利益的丑恶嘴脸，同时揭示军事扩张如何挤占民生投资、拖累国家发展，让社会各界认识到战争不符合美国利益。

（四）发挥中国优势，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中国和平内敛的国家性质，可以通过成为世界稳定基石，赢得更为深厚、长久且正当的全球领导力，所以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绝非应对战争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自身国情与人类命运的战略选择：一方面，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广阔的内需市场，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超越零和博弈的发展机遇，破解个别国家发起的关税战、贸易战，以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引领世界走向持久和平；另一方面，中国坚持永不称霸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始终倡导以文明互鉴化解文明冲突、以共同发展守护世界和平，可以主动搭建大国沟通平台，积极引导中、美、日大三角回归和平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 周友刚. 为什么中国崛起势不可挡？[J]. 特区经济，2025（11）：5-9.
[2] 周友刚. 中美关系会好吗？[J]. 特区经济，2025（02）：5-9.
[3] 周友刚，张立垭. 美国做错了什么？——以波音公司的发展与衰败为例 [J]. 特区经济，2024（12）：12-19.
[4] 周友刚. 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引领世界发展？——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 [J]. 特区经济，2025（08）：17-23.
[5] 周友刚. 为什么中国会打赢贸易战？——兼论中国务必弘扬改革开放精神 [J]. 特区经济，2025（06）：18-22.

引用本文 周友刚. 战争与和平：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历史走向分析 [J].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2026, 8(1):61-74.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6.

Cite This Article Yougang ZHOU.(2026). War and Peac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China-U.S.-Jap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 Science*(*Shèhuì kēxué lǐlùn yǔ shíjiàn*), 8(1):61-74. https://doi.org/10.6914/tpss.080106

War and Peace: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China-U.S.-Jap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Yougang ZHOU[1]

1.Center for World Economy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872, Beijing,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the China-U.S.-Japan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shapes the global landscape, ye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increasingly leveraging the Taiwan issue as a central tool to contain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nature of these three nations,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and current dynamics of their interactions, assesses the likelihood of war, and advocates for all-out efforts to avert conflict while striving for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future. The United States lacks the capacity to sustain global hegemony. Though its people yearn for peace, its interest groups are bellicose and eager for conflict, unwilling to exit the historical stage. Japan, a resource-deprived island nation, must seize external resources to sustain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Yet, facing persistent trade deficits and a dead-end situation, it seeks to carve out living space through war once again. Consequently, China, which consistently adheres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sees

it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rapidly growing, lacks any motivation for war but is forced to respond to the threat of conflict.

keywords Nature of the State; Triangular Relations; Risk of War; Peaceful and Friendly

〔责任编辑：孙强　Email: cpcl@cpcl.hk〕